

《山海经》研究综述

孙 玉 珍

(天津师范大学 中文系,天津 300073)

[摘 要] 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奇书,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。特别是近几十年来,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,主要体现在《山海经》的版本和校注、篇目考证、作者和成书年代研究、性质研究、《山海经》图研究,但也存在一些不足,如注释尚不完善,对其艺术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。

[关键词] 《山海经》;研究综述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2-0040(2003)01-0109-04

《山海经》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,自成书至今,公认为是一部奇书。说它是一部奇书,是因为它在不到 31000 字的篇幅里,记载了约 40 个方国,550 座山,300 条水道,100 多个历史人物,400 多神怪奇兽。《山海经》集地理、方物(矿产、动植物)、民族、民俗等于一身,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神话。它以神秘莫测的面貌吸引着古今学者对它进行探讨,以图解开它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一、《山海经》的版本和校注

《山海经》之名最早见于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:“太史公曰:《禹本纪》言,河出昆仑:……故言九州山川,《尚书》近之矣,至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,所有怪物,余不敢言之也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山海经》18 卷,东晋时郭璞为《山海经》作注 18 卷。从此以后的千余年里,没有留下一部有影响的注本。直到明代,杨慎著《山海经补注》1 卷,王文焕著《山海经释义》18 卷,但与郭璞注本相比,均无重大的突破,学术价值也不高。《山海经》的校注在清代可谓集大成,不仅注本众多,而且学术价值比较高。其中吴任臣的《山海经广注》18 卷,汪绂的《山海经存》9 卷,毕沅的《山海经新校正》18 卷,郝懿行的《山海经笺疏》18 卷最值得称道。这一时期主要是对《山海经》进行注释和考证。吴任臣的《山海经广注》是对郭璞《山海经注》的补正之作,“于名物训诂,山川道里,皆有所订正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 142),但引据过繁,考证未当。汪绂的《山海经存》的特色是图文并存,孙楷第称此书“拾遗补阙,上溯经史,下逮百家,凡有涉于《山海经》者,莫不搜采征引,重为厘定,而于荒诞之说尤严于辨证”^[1]。清代注本中第一部精品当推毕沅的《山海经新校正》,他系统地考证了版本的流传与变异,经文校勘精细准确,因他长于地理之学,故对《山海经》的山川地理形势,考证极详,但对于训诂名物,则不免疏略。在毕沅稍后的郝懿行所作的《山海经笺疏》,则又是一部不朽之作,其特点是长于训诂与考证。

[收稿日期] 2002-12-05

[作者简介] 孙玉珍(1978-),男,山东莱州人,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。

20世纪对《山海经》的整理、校注最有成就的是袁珂先生。袁珂先生是著名的神话学家,他于1963年完成《海经新释》,1978年完成《山经柬释》,合两书而成《山海经校注》。校注集前代学者研究之大成,校勘精审,材料搜罗丰富并考据源流,特别是对神话的解释有独到之处。书中有大量的插图,卷末附有山名、地名、人名、神名、怪名、动植物名、矿产名索引,对研究者极为便利。80年代袁珂又出版了《山海经校译》,并且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,使他成为当代《山海经》研究的第一人。

二、《山海经》的篇目考证

《山海经》是由刘向、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所校定而成的。刘秀(歆)在《上山海经表》中云:“所校《山海经》凡三十二篇,今定为一十八篇,已定。”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《山海经》13卷。郭璞注《山海经》定为18篇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山海经》23卷,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载18卷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23卷,皆为郭璞注本。今天流行的是18卷本。由此可见《山海经》篇数不一,让后人争论不休。最早系统考证《山海经》篇数的是毕沅,他在《山海经新校正》卷首有一篇《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》,详尽地考证了《山海经》古今本的篇次与变化,认为刘向的13卷包括《山经》5卷、《海内经》4卷、《海外经》4卷,刘秀所校的32篇是34篇之误,包括《山经》26篇、《海内经》4篇、《海外经》4篇。刘秀所上的18卷本是在其父所定的13卷本基础上又加上《大荒经》以下5篇,遂成定本,亦即今天所流行的《山海经》全本。郝懿行在《山海经笺疏·叙》中也论及篇目,所识大体与毕沅相同,并认为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:“古经残简,非复完篇,殆自昔而然矣。”袁珂认为:“《山海经》篇目古本为三十四篇;刘向《七略》以《五藏山经》五篇加《海外经》《海内经》八篇为十三篇,《汉志》因之;刘秀校书,乃分《五藏山经》为十篇而‘定为十八篇’;郭璞注此书复于十八篇外收入‘逸在外’的《荒经》以下五篇分为二十三篇,即《隋志》所本;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复将刘秀原本所分的《五藏山经》十篇合为五篇,加《海内外经》八篇,《荒经》以下五篇为十八篇,求符刘秀表文所定篇目,即今本。”^[2]袁珂先生所作的结论合理地解释了《山海经》的篇目之谜。

三、《山海经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研究

关于《山海经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亦是众说纷纭,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。刘秀在《上山海经表》云:“《山海经》者,出于唐虞之际……禹别九州,任土作贡;而益等类物善恶,著《山海经》。”王充《论衡·别通篇》、赵晔《吴越春秋·赵王无余外传》、郭璞《山海经叙》皆认为《山海经》乃禹益所作而后人有妄增部分,成书于虞夏之际,为先秦古书。朱熹、胡应麟等则认为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战国末期,是“战国好奇之士”所作,否认了禹益所作的可能性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此书“断不作于三代以上,殆周、秦间人所述,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盖之欤?”这一观点又被学术界所阐发,认为《山海经》并非作于一时一人,而是代有增益,逐渐成书的。毕沅的《山海经新校正》综合诸家之说,认为《山经》部分为禹益所作,《海外经》和《海内经》是周秦人所述,《大荒经》则出自刘秀之手。进入20世纪后,陆侃如先生认为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战国至魏这一漫长的时代,其中《山经》为战国楚人所作,《海内经》和《海外经》为西汉人作,《大荒经》和《海内经》为东汉或魏晋时人所作。^[3]茅盾认为《山海经》的成书年代可定为:《五藏山经》东周时作,《海内外经》至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,《荒经》的成书时代也不会太靠后。^[4]蒙文通断定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,《海内经》是古蜀国人所作,《大荒经》是巴国人所作,《山经》和《海外经》是楚人所作;总之《山海经》是南方人所作。^[5]袁珂认为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战国中期至汉代初年:《大荒经》四篇和《海内经》一篇成书最早,大约在战国初期至中期;《五藏山经》和《海外经》成书于战国中期至晚期;《海内经》四篇成书于汉代初年。它们的作者都是楚人,即楚国或楚地的人。^[6]孙致中则认为《山海经》“著作于西周”,“最早的编著者是西周时殷遗巫师”,“历东周、春秋战国,数百年间的巫师们对它的内容进一步充实、丰富,秦汉时的文士们对它又有所增饰”^[7]。尽管大家的具体意见是不相同的,但已达成共识:《山海经》的著者不是一人,成书年代也不是一时。

四、《山海经》的性质研究

《山海经》的性质两千年来莫衷一是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它放入数术略形法家中,与《宫宅地形》《相人》《相宝剑》《相六畜》等书列在一起,显然是把它作为“形法家书”来看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“形发者,大举九州之势,以立城郭舍形,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,器物之形容,以及其声气贵贱吉凶。”可见“形法家”乃是一种根据山川、城郭、宫舍、器物、人及六畜的形与貌以推断吉凶贵贱的学说。其后,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王尧臣《崇文总目》尤袤《遂初唐书目》等把《山海经》放入地理类,显然是把它作为“地理书”来看待。明代的胡应麟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认为《山海经》是“古今语怪之祖”。到了清代,《四库全书》把它放在小说家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述改列的理由云:“书中述山水,多参以神怪……核实定名,实则小说之最古耳。”《提要》分小说为三派:其一叙述杂事;其一记录异闻;其一缀辑琐语。《山海经》为异闻之属。所谓“异闻”,即是神话传说,异闻怪事。

进入20世纪,研究者虽给它定性不一,但大体上没有跳出上述三种说法,只是有些深化和发挥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:一是巫书说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:“《山海经》今所传本十八卷,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,以为禹益作者固非,而谓因《楚辞》而造者亦未是;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精(精米),与巫术合,盖古之巫书也,然秦汉人亦有增益。”^[8]鲁迅的“古之巫书”说被孙致中^[9]和翁银陶^[10]所接受,并加以发挥,从巫、巫术与《山海经》的编书形式和记载的山川地理、物产、神话等方面加以阐释,以此来证明“巫书说”。二是神话著作说。20世纪首先认定它为神话集的是茅盾,茅盾说它“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”^[11]。袁珂虽然不否认鲁迅的巫书说,但他更倾向于神话著作说,他在《山海经校注·序》中说:“《山海经》匪特史地之权舆,亦神话之渊府。”三是信史说。在当代有许多学者都认为是信史。张岩在《山海经与古代社会》一书中认为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大型原始文明形成阶段的历史实录。王大有认为:“《山海经》是一部以古代地理为整体结构的,记载了距今约8000年至3000年中国上古图腾社会珍贵史料的综合性通史著作。”^[12]以胡远鹏、杨卓、宫玉海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人类学、语言学、民族学等方面研究,提出了不同的见解,使人耳目一新,如神话中的“勾龙氏”即皋落氏,即俄罗斯;《大荒东经》的“轩辕国”即今天的匈牙利;《大荒南经》的“胡裔”即今天的澳大利亚。《山海经》中的地名有许多涉及到世界各地的地理。《山海经》是信史,是一本上古世界大观。当然现在这些观点已经销声匿迹了,表明这些观点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,是站不住脚的。

五、《山海经》图研究

大多数学者已认定《山海经》先有图后有经,经是对图的解释。《山海经》有图,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郭璞曾作《山海经图赞》,在给《山海经》作注时,又有“图亦作牛形”、“在畏兽画中”等文字,陶渊明曾作“流观山海图”的诗句,可知晋代尚有图。据资料记载,《山海经》图至少有下列三种:一是古图。明代杨慎在《山海经后序》中说:“九鼎之图……谓之曰山海图,其文则谓之《山海经》。至秦而九鼎亡,独图与经存……今则经存而图亡。”^[13]毕沅在《山海经新校正·古今本篇目考》中也说:“《山海经》有古图,有汉所传图。”可知九鼎图、汉所传图以及郭璞作《山海经图赞》、注《山海经》,陶渊明写“流观山海图”诗时见到的山海图,都属于古图。二是南朝画家张僧繇与宋代校理舒雅绘画的十卷本《山海经图》。据《中兴书目》,梁张僧繇曾画《山海经图》十卷,宋代校理舒雅于咸平二年(999年)重绘为十卷。三是今所见图。郝懿行在《山海经笺疏叙》中说:“今所见图复与繇、雅有异。”郝懿行所说的“今所见图”指的是目前所见到的明清时期绘制与流传的《山海经图》。前两类图已亡佚。当代对《山海经》图最有研究的当属马昌仪,她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,如最近在《文学遗产》2000年第6期发表的《山海经图:寻找〈山海经〉的另一半》和《文艺研究》2001年第3期发表的《明刻山海经图探析》,并且出版了专著《古本山海经图说》(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1版),其中包括1000幅图和25万字的图说。她把研究者对《山海经》古图的研究归为四类:禹鼎说、地图说、壁画说和巫图说,并认为巫图说是比较有根据的。^[14]

六、《山海经》的艺术研究

对《山海经》进行艺术研究的很少,几乎没有什么成篇的研究,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个空白。只有杨义先生在《中国古典小说史论》中第一章专门讨论了“《山海经》的神话思维”,他从神话思维方面来探讨《山海经》的艺术特色,以“迥异于史诗神话的原始性、非情节性和多义性”、“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”、“二元对应原则与海外奇思”、“日月神话人伦化与英雄神话”为标题研究《山海经》的神话思维,并认为《山海经》是以地理方位来统帅千奇百怪的神异幻想组成的全文结构^[15]。杨义先生以诗化的语言勾勒出了《山海经》的艺术特色。

《山海经》自成书起到近几十年来,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研究历程,但研究程度还远远不够,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,甚至还有空白领域。《山海经》研究应该注重文本,注重它的艺术方面的研究,而不只是它的内容。此外对《山海经》的注释,虽然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,但也有一些不能明确或疏漏之处,这是应该加以努力的地方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孙楷第,戴鸿森.戏曲小说书录解题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.1.
- [2][6]袁珂.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[A].中华文史论丛(第七辑)[C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171-147-171.
- [3][4][11]茅盾.神话研究[M].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81.147-150 151-28.
- [5]蒙文通.山海经写作时代及其产生的地域[A].中华文史论丛(第一辑)[C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2.76-78.
- [7]孙致中.山海经的作者及著作时代[J].贵州文史丛刊,1986,(1):78-82.
- [8]鲁迅.中国小说史略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3.9.
- [9]孙致中.山海经的性质[J].贵州文史丛刊,1985,(3):102-106.
- [10]翁银陶.山海经性质考[J].福建师范大学学报,1985,(4):83-88.
- [12]汪大有.山海经是上古史书[J].新华文摘,1990,(4):197.
- [13]杨慎.山海经后序[A].丁锡根.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[C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6.7-8.
- [14]冯昌仪.山海经图:寻找《山海经》的另一半[J].文学遗产,2000,(6):21-25.
- [15]杨义.中国古典小说史论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5.35-52.

(责任编辑 刘迎秋)